



内部资料

# 国际财经评论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Business

2021 年·夏

北京外国语大学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

北京外国语大学南方研究院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产业金融管理专业委员会

2021 年 6 月《国际财经评论》(内刊)



公众微信号

地 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内大厦 510 办公室

邮 编：100089

联系人：金老师

联系方式：010-8881 8121

传真：010-8881 0062

收稿邮箱：g20@bfsu.edu.cn

jinyujie@bfsu.edu.cn

网站：g20.bfsu.edu.cn

---

# 目录

第一章 伊朗新当选总统莱西经济政策展望.....	2
第二章 数字普惠金融更加促进企业创新吗? .....	6
第三章 美股市场中概股: 回望与展望.....	7
第四章 美式“小多边主义”对全球产业链布局的影响.....	8
第五章 媒体舆情关注度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18
第六章 贸易摩擦和疫情对中国制造业的冲击及对策研究.....	28
第七章 估值效应波动与全球经济失衡.....	39
第八章 数字普惠金融能减少中国的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吗? .....	40

# 第一章 伊朗新当选总统莱西经济政策展望

穆宏燕 赵锦浩 牛华勇<sup>1</sup>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月19日报道，伊朗总统选举委员会主席贾马尔·阿尔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伊朗第13届总统选举的初步统计结果。初步统计显示，有2860万人参加了投票，伊朗司法总监易卜拉欣·莱西赢得了1780万张选票，得票率约为62%。伊朗政局将由“温和派”执政转向“强硬派”执政。此次选举出现了“低投票率，高得票率”的矛盾情景，为莱西将来的任期蒙上一层厚重的不确定性。

表 1-1 莱西两次参选对比

	2017年首次参选	2021年二次参选
参与投票人数（投票率）	4000万（71%）	2860万（48%）
莱西得票数（得票率）	1520万（38%）	1780万（62%）

\*投票率=参与投票人数/登记选民数；得票率=莱西得票数/参与投票人数

## 一、莱西参政经历

1960年12月，莱西出生于伊朗东北部什叶派圣城马什哈德的一个什叶派乌莱玛家庭，自幼受到宗教熏陶。在他还在蹒跚学步之时，伊朗国内政治正经历着由巴列维国王主导的西化运动“白色革命”。1975年，尚未成年的莱西来到伊朗最大的神学院、什叶派最重要的神学中心、库姆神学院学习。当时，许多在库姆的神职人员和学生都投身于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运动，反对巴列维政权，莱西也积极参与其中。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霍梅尼在反巴列维势力的支持下重返伊朗，在他的主导下，“法基赫监护”（教法学家监护）之下的政教合一政体——伊斯兰共和国在巴列维王朝的废墟上成立。

<sup>1</sup> 穆宏燕，女，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外伊朗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伊朗宗教、历史与文化等领域。

赵锦浩，男，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伊朗政治与文化。

牛华勇，男，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北京外国语大学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高等教育国际化等。



图 1-1 易卜拉欣·莱西像

莱西因其神学背景和政治立场而被认为属于强硬派，其职业生涯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捍卫新生政权伊斯兰共和国。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莱西被选中参加行政管理培训课程，为这批未来公职人员授课的神职人员之中就有如今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19岁时，莱西被任命为德黑兰附近卡拉杰市一家地方法院的书记员。到20岁时，莱西已是卡拉杰的首席检察官。1985年，莱西被擢升为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副检察长。1989年，霍梅尼去世，哈梅内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领袖。在此之后，莱西开始在伊朗的司法系统中步步高升，先后担任德黑兰总检察长、伊朗首席副法官和伊朗司法总监等要职。除了曾担任许多高级司法职位外，哈梅内伊还在2016年任命莱西担任马什哈德伊玛目礼萨圣地的监护人，该圣地被称为“伊朗什叶派之心”，旗下有伊朗财力最雄厚的宗教基金会。任命时，哈梅内伊称莱西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有着出色的经历”。2019年，哈梅内伊正式任命莱西为伊朗司法总监。哈梅内伊在任命声明中表示，提拔莱西的原因是其在司法和神学方面拥有丰富的知识、公正无私的精神、极高的可信度以及多年的司法工作经验。他呼吁莱西在新岗位上和“人民、革命站在一起，反对贪腐”。基于此，外界普遍认为莱西有可能接任年事已高的哈梅内伊（现年82岁），成为下一任伊朗最高领袖，而担任总统有助于提升治国理政能力。

## 二、经济政策展望

### 2.1 伊朗内部——延续“抵抗型经济”政策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分析指出，经济情况往往是决定伊朗总统成败的关键因素。民生问题是下一届政府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选举中的“高支持率”虽然体

---

现莱西拥有一群坚定的支持者，但是“低投票率”也反映民众对目前政局的失望，这意味着未来留给莱西通过解决民生问题缓和伊朗国内矛盾的时间非常有限。

“民生所指，国运所系”。未来作为总统，摆在莱西面前的是一个经济危机深重的国家，莱西将不得不把发展经济作为施政重点。莱西上台后，首要是应对严峻的经济问题，缓解失业问题，降低通货膨胀，控制新冠疫情并摆脱美国制裁。但是，他的从政经历中鲜有涉及经济事务，缺乏经济工作经验。顽固的体制弊病也将限制经济改革，降低经济政策效力。

因此，作为哈梅内伊的嫡系和未来最高领袖的热门人选，他大概率将继续执行哈梅内伊的“抵抗型经济”政策。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IRNA）报道称，在决定参加大选后，莱西向伊朗民众发出公开信，称其并不谋求权力和地位，选举的结果必须是实现真正的“转变”，使得人民的生活恢复希望和活力。在 2021 年 6 月 21 日，莱西首次作为新总统举行的发布会上，他表示：“美国的极限制裁并未被证明是有效的，外国必须重新审视他们的立场……伊朗的经济形势并不一定要谈判”。这表明莱西依旧将经济重心放在国内，着力于“抵抗经济”政策。2012 年，伊朗的原油出口遭欧美最严厉制裁、其金融体系也被西方世界隔离，时任伊朗最高利益委员会秘书长、前革命卫队总司令及 2013 年伊朗总统大选候选人雷扎伊，向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提交了一份建设抵抗型经济的报告，旨在应对制裁，降低对石油工业的依赖，解决伊朗高企的通胀率和失业率，增强经济活力，最终提高伊朗经济的独立性和韧性。当时，伊朗最高领袖高度评价并批准了这份报告，并表示“敌人”正对伊朗经济下手，通过阻止伊朗经济发展，使民众脱离伊斯兰教义，并称建设抵抗型经济将是有效抵御外部冲击、打赢“经济战”的有效途径。莱西执政后，毫无疑问将继续贯彻“抵抗型经济”的政策，提高伊朗经济的抗制裁能力，并维护伊朗的国计民生。

## 2.2 《伊核协定》谈判——前后相承，以民为本

虽然，与哈梅内伊一样，莱西曾对 2015 年签订的伊核协议感到深恶痛绝，不愿以任何形式延长该协议。在 2017 年伊朗总统选举中，作为候选人之一的莱西就曾批评时任总统鲁哈尼缔结的伊核协议未能改善该国底层的社会经济状况。不过，莱西并不反对伊核协议本身，他曾在 2017 年大选的电视辩论中称尽管该协议“有缺陷”，但仍是一份“国家文件”。伊朗当地媒体此前也报道称，莱西在 2021 年总统选举辩论中表示，倘若符合“人民的利益”，他将支持恢复伊核协议。竞选期间，莱西曾这样说：“我们将尊重协议，但条件由我们而不是美国设定。”因此，莱西当选总统不至于对目前围绕拯救《伊核协定》进行的谈判产生实质性影响。

---

## 2.3 中伊合作——稳中向好，行稳致远

莱西的当选无疑利好中伊关系，伊朗发展对华关系将更加坚定。在6月21日举行的记者会上，在回答中国央视记者提问时，莱西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以来，伊朗历届政府始终致力于发展对华关系。当前两国关系良好，且有着较大的发展潜力。伊朗将继续努力挖掘和利用这一潜力，推动两国友好关系发展。伊中全面合作计划是伊外交政策中的一项双边协议，落实该计划将成为本届政府工作之一。”近年来，伊朗国内出现了积极的主张发展对华关系的声浪。不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高度认同中国的发展成就，而且伊朗高层重视对华关系的共识也在逐渐增强。这也是过去几年中伊关系得到长足发展的重要原因。

莱西当选总统，伊朗将更具有发展中伊关系的国内政治条件。作为最高领袖高度认可的“继承人”，莱西没有理由不奉行领袖“向东看”的国家战略。更何况，作为美国制裁名单上的人物，莱西“向西看”的路很难走通。美国不太可能因为莱西当选总统而将其从制裁名单上删除，而且作为制裁对象，莱西也难以做出主动向美示好或示弱的政策取向。在目前的结构下，加强对华关系将是莱西最好的选择。

今年是中伊建交50周年，两国的双边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25年全面合作协议可以说是两国关系中最重要成就。在美国对伊朗施加经济制裁的背景下，中伊全面合作协议中所涉及的电信、港口、铁路、医疗保健和信息技术均是伊朗当前亟需改善但又难有作为的重要领域，在金融、能源领域的深度合作同样也符合两国长期利益。中国对伊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将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促进伊朗经济增长，改善经济环境，提高经济活力，改善底层社会的经济状况，帮助伊朗脱离“高失业、高通胀、低增长”的经济窘境，提高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度。

“民心所向，政之所行”。因此，可以预计，莱西上任后，中伊合作将在既有的合作框架下，“稳中向好，行稳致远”。

---

## 第二章 数字普惠金融更加促进企业创新吗？（略）

任康钰 刘璐璐 王源<sup>2</sup>

---

<sup>2</sup> 北京外国语大学

---

## 第三章 美股市场中概股：回望与展望

乔国荣 马遥 毛婧宁 王俊<sup>3</sup>

---

<sup>3</sup> 乔国荣，川财证券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资本市场与证券分析；

马遥，中证数据有限责任公司，市场分析部副总监，研究方向：资本市场与宏观经济；

毛婧宁，中证数据有限责任公司，市场分析部研究员，研究方向：资本市场与证券分析；

王俊，中证数据有限责任公司，风险监测部研究员，研究方向：资本市场风险分析。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文责自负。本文为《清华金融评论》在投稿件，请勿公开发表或发布

---

# 第四章 美式“小多边主义”对全球产业链布局的影响

王思语<sup>4</sup> 侯鹏<sup>5</sup>

**【摘要】** 2008 年经济危机以来，各国尤其是美国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似乎表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抬头，但美国一系列的退出加入世界各种多边体系的行为，并不是在所谓全球化问题上倒行逆施，而是以一种全新，更加强势的方式重新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并持续从中获利。本文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角度出发，分析美国当前的一系列贸易政策对全球产业链布局的影响，和对我国产业升级以及对“中国制造 2025”带来的挑战。并从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角度，提出中国的应对措施，以合纵连横<sup>6</sup>的姿态强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使中国和世界经济紧密捆绑。

**【关键词】** 全球产业链；小多边主义；贸易体系

## 一、前言

从 1947 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在日内瓦签订至今，全球经济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已经走过了七十多个年头，产业链也逐渐地从集中走向分布式衍变，产品自研发设计到加工成品需要经过多个国家才能完成生产。但 2008 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世界经济进入到了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和高债务、高赤字（“三低两高”）的调整时期，经济的持续低迷，势必会造成部分国家做出以邻为壑的行为。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格局逐渐被打破，双边贸易摩擦不断，似乎世界经济贸易逐渐进入了逆全球化时期。

2017 年 1 月 20 日，唐纳德·特朗普正式在白宫就职，奉行“美国优先”的原则，特朗普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退群”行为。2017 年 1 月，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 TPP）、同年 4 月重新开展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同年 7 月重新开展美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同年 10 月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一系列“退群”行为被大多数学者认定为是“逆全球化”的主要表现，使得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被终止甚至开始倒退。但近年来，美国又与多个贸易伙伴签订协定或者发布联合声明，例如，2018 年 7 月美欧日发布“零关税”声明、同年 9 月美韩发表声明，宣布完成新《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新美韩 FTA）

---

<sup>4</sup> 作者信息：王思语，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经济学博士，讲师，研究领域：国际贸易、全球价值链，邮箱：wangsiyu2014phd@163.com。本文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9CJY025）资助。

<sup>5</sup> 侯鹏，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专业硕士生，研究领域：服务贸易、全球价值链。

<sup>6</sup> 简称纵横，是战国时期纵横家所宣扬并推行的外交和军事政策。

---

的修订、同年 11 月正式签署《美墨加新贸易协定》（以下简称为 USMCA）、2020 年 1 月中美双方在华盛顿签署作为第一阶段协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以下简称《中美经贸协议》）。2021 年 1 月 20 日，约瑟夫·拜登宣布就职，之后便陆续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和 WHO。

由此可见，美国并不是要退出全球化，而是要改变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经贸规则，重塑自己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打造有利于自己的全球贸易规则体系。所以美国在短时期内重新修订贸易协定或者退出又重新加入上述多边制度性安排，就是为了表达自己对现有多边机制以及在其背景下的全球化现状的不满。美国并非反对全球化，而只是反对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全球化；美国并非反对多边或全球性规则，而是对现行的多边或全球性规则不满。<sup>7</sup>所以，美国试图舍弃 WTO 多边贸易体系，转向推进多个双边、区域或小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搭建以美国为核心的美式“小多边主义”贸易体系。<sup>8</sup>本文通过理解美式“小多边主义”分析对全球产业链布局的影响和对中国产业链升级带来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的中国方案。

## 二、美式“小多边主义”内涵

### 1 小多边主义内涵

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是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核心特征。以世贸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为核心的全球性多边机制构成国家间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并通过机制内部的竞争性调整和改革保持了架构与功能的基本稳定。<sup>9</sup>但 WTO 多哈回合谈判陷入长期停滞，IMF 改革更是收效甚微，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迫切渴望在国际多边机制中得到更大的话语权，美国更是由于贸易逆差问题与许多国家频繁挑起贸易摩擦，重新修订所谓“不公平”的自由贸易协定，于是许多国家开始寻求建立更加灵活多边的“小多边机制”，维护自身在国际政治、经济、贸易等领域的利益。

国内学者对“小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sup>10</sup>中参与方的数目存在争议。苏长和认为，判断多边主义或者少边主义的标准不在于参与方数目的多寡，而在于实现合作的形式。如果参与方数目的多寡与达成合作无关，那么多边主义的制度安排成为可能；相反，如果参与方

---

<sup>7</sup> 车丕照：《是“逆全球化”还是在重塑全球规则？》，《政法论丛》2019 年第 1 期，第 16 页。

<sup>8</sup> 沈伟，徐驰：《逆全球化背景下美式“小多边主义”的端倪和成型——理解《中美经贸协议》（第一阶段）的变局背景》，《海峡法学》2020 年第 3 期，第 38 页。

<sup>9</sup> 杨慧：《国际经济机制变迁的竞争性多边主义趋向》，《现代国际关系》2020 年第 1 期，第 50 页。

<sup>10</sup> 苏长和、张勇等学者将 minilateralism 翻译为“少边主义”；王红英、杨国梁、沈伟等学者将其翻译为“小多边主义”，本文采用“小多边主义”的翻译。

数目的多寡成为合作能否达成的关键因素，那么便会选择少边主义的制度。<sup>11</sup>顾静认为，“小多边”通常参与方数目比较少，只有三到五个成员参与。<sup>12</sup>张勇认为，“少边主义”可以定义为由特定共同利益或相关干系的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国家行为体构成，追求集体行动效率，在既有制度框架内外，寻求协调政策、构建共识、解决问题。<sup>13</sup>笔者认为，美式“小多边主义”区别于上文所提及的“小多边主义”的制度安排，美式“小多边主义”是以自身利益为导向，通过与少数国家（三个左右）各种贸易协定谈判，改变由于经济全球化之后，在现有贸易体系下美国所处的不利地位，重新建立依旧由美国为主导地位的世界贸易体系，如图 4-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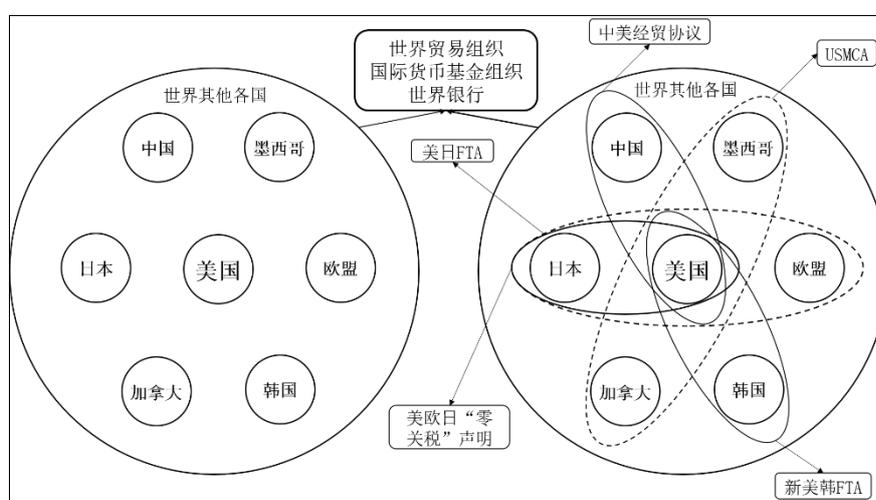


图 4-1 美国主导贸易体系演化图

## 2 美式“小多边主义”的起因与目的

美式“小多边主义”顾名思义，是相较于当前如 WTO 等国际贸易体系的多边主义而言，以美国为主导，构建起美国在全球产业链中高端技术的护城河，保护美国核心技术，限制甚至打击中国的制造业崛起的新世界贸易体系。

### 2.1 美式“小多边主义”的表面起因——国际分工导致的美国贸易失衡

自上世纪 70 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美国开始持续处于贸易逆差的状态。就货物贸易而言，进入 21 世纪，美国对外商品贸易逆差就突破了 4000 亿美元。虽然 2008 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对外商品贸易逆差有所下降，但之后更是一路飙升，2020 年已经达

<sup>11</sup>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 23 8~239 页。

<sup>12</sup> 顾静：《美国多边主义东亚新政策剖析》，《东南亚研究》2011 年第 6 期，第 51 页。

<sup>13</sup> 张勇：《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地区“少边主义”外交浅析》，《美国研究》2012 年第 2 期，第 66 页。

到了 9751 亿美元，高居全球首位。所以，美国历届政府上台，扭转美国长期贸易逆差的状态、降低贸易逆差的规模都是其最重要的执政目标之一，为此美国曾对世界多个主要经济体发起过不同程度的贸易摩擦。但正如图 4-2 所示，美国贸易逆差的状态和规模非但没有根本改善，还有趋于恶化的趋势。所以，通过美元贬值或者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sup>1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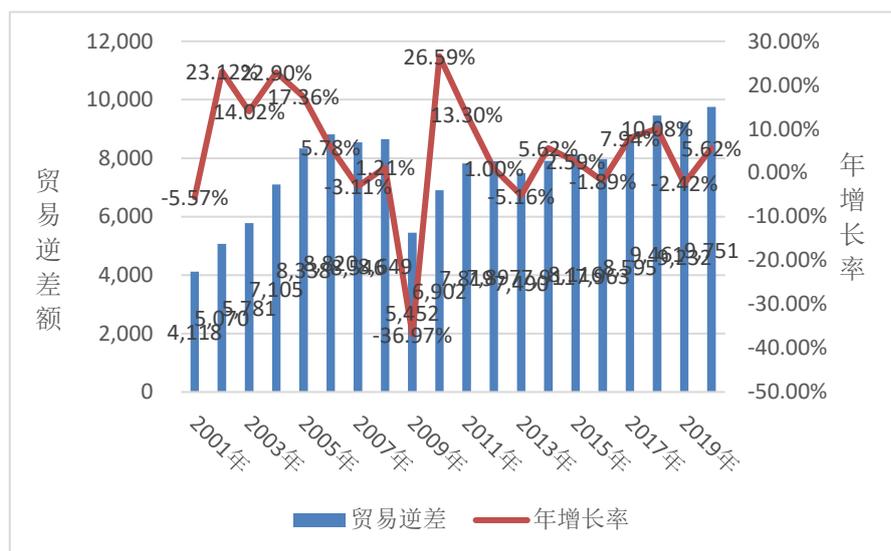


图 4-2 美国总进出口贸易流量

数据来源：由联合国贸易数据库整理所得。

从国际分工的角度来看，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形成的原因，是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也是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的必然结果。<sup>15</sup>美国由于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顶端，主要从事的是附加值较高的研发设计环节，代工生产等附加值较低的环节被转移到世界劳动力价格较低的国家。于是制造业的外流、失业率增加的情况便逐渐被美国政府归因于所谓“不公平”贸易规则，并成为美国大选中不可避免的话题之一，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更是把矛头直指主要的贸易伙伴国。正是在现有分工格局下，美国无法扭转现有贸易逆差的状态，便寻求突破原有的贸易制度安排，退出 TTP，重新开展与墨西哥、加拿大、日本、韩国、中国的贸易协议，便是力图打破 WTO 框架下全球贸易格局的最好证明。在“多边主义”参与方较多，涉及议题广泛而复杂，难以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开展“小多边主义”的贸易制度安排，便可以主导贸易谈判进程，力争更多的贸易利益。2021 年 3 月，美国贸易代表办

<sup>14</sup> Ronald Mckinnon. The U.S. saving deficiency, current-account deficits, and industrial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China [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13,35(3):449-458.

<sup>15</sup> 蓝庆新，窦凯《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美贸易摩擦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 年第 5 期，第 67 页。

---

公室公布了《2021 年贸易议程报告和 2020 年年度报告》，更是将中国特别列为唯一一个“拜登政府将应对”的国家，可以看出，新一届政府为了维持美国的科技霸权和美元霸权，依旧会对华采取强硬的贸易政策，维护美国利益。<sup>16</sup>

## 2.2 美式“小多边主义”的本质起因——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竞争升级

2018 年 11 月 30 日，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领导人正式签署 USMCA，形成了美式“小多边主义”体系的第一块基石。<sup>17</sup>其中 USMCA 第 32.10 条规定了非市场经济国家条款，即所谓的“毒丸”条款<sup>18</sup>。美国意图通过控制加拿大和墨西哥与其它国家签署贸易协定，宣泄对中国贸易政策不满，并想遏制和孤立中国。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在入世十五年后中国无需其他国家的承认，便可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但美国曾多次质疑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欧日等世界主要经济体也均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所以美国利用 USMCA 中“毒丸”条款的目的就是要锁定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和水平，从而把中国的发展方向 and 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威胁或挑战美国世界主导权的范围以内。<sup>19</sup>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和美国正面竞争的阶段。从此轮中美贸易摩擦的内容来看，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关税重点侧重在具备较高技术含量如医疗器械、信息技术等技术密集型产品上。中国企业正在逐步攀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如华为、中芯国际等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已经成为高技术附加值的上游生产商。虽然 2000~2018 年中国整体行业 GVC 位置指数均小于 0，与美国相比，我国整体行业仍处于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但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已经从 2000 年的-0.13 上升到了-0.04，特别是中高技术行业的 GVC 位置指数，2018 年已经达到了-0.01。<sup>20</sup>这表明不管从整体行业来看或是从中高技术行业来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逐渐由低端迈进中高端。在中国加快推进“中国制造 2025”的战略下，中国制造业已经具备冲击高端制造业的能力，从最初加工代工生产的低端稳步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正是因为中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发展趋势不断接近，美国才意图通过“小多边主义”孤立中国，遏制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

---

<sup>16</sup> <https://new.qq.com/omn/20210303/20210303A0B3HA00.html>， 登录时间：2021 年 7 月 6 日。

<sup>17</sup> 沈伟，徐驰：《逆全球化背景下美式“小多边主义”的端倪和成型——理解《中美经贸协议》（第一阶段）的变局背景》，《海峡法学》2020 年第 3 期，第 38 页。

<sup>18</sup> 该条款规定 USMCA 中的任何一方在与非市场经济主体商谈自贸协定之前，应提前三个月通知其他缔约方；在与非市场经济体签署自贸协定前不晚于 30 天向其他缔约方提交意欲签订的自贸协文本以供审查；如果缔约方与非市场经济体签署的自贸协定生效，那么其他缔约方则有权在提前 6 个月通知后退出 USMCA。

<sup>19</sup> 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清华金融评论》，2018 年第 7 期，第 24 页。

<sup>20</sup> 蓝庆新，窦凯《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美贸易摩擦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 年第 5 期，第 67 页。

---

易往来，阻断中国迈向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进程。

### 3 美式“小多边主义”模式（以美墨加贸易协定为例）

#### 3.1 以美国利益为核心

美式“小多边主义”核心的内容便是以美国利益为主。以汽车行业为例，美国为实现重振制造业的目标，在 USMCA 中，提高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中汽车原产地规则的零部件在北美三国生产的百分比到 75%，这条款旨在降低部分在亚洲生产的汽车零部件的进口。同时规定北美生产的汽车所使用的钢铁、铝材灯原材料必须保证在 70%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生产。在与韩国重新开展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中，美国同样强调其在汽车贸易中的赤字规模，要求韩国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但却将韩国对美小型载货卡车 25%的关税撤销时间延长了 20 年，并且将韩国出口美国的钢铁量限制在 2015-2017 年韩国对美出口额的 70%。同样，美国通过对日本钢铝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启动对日本汽车、零部件产品的“232”调查，迫使日本与美国开展贸易谈判。在拜登上台之后，推出了“两万亿美元”基建计划，其中 6210 亿美元将用于加大对基础交通领域的改造升级计划、3000 亿用于提升美国制造业的能力，强化美国供应链。<sup>21</sup>此计划便是要更大化前期签署贸易协定的成果，刺激经济，重振美国制造业。

#### 3.2 以美国主导为原则

美国认为 WTO 多边机制不能对新兴经济体国家进行约束，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承担国际义务的多寡不均的问题，于是通过干预 WTO 上诉机构成员的任命企图将 WTO 的争端解决功能丧失，以便于美国在多边之外形成全新的规则制度模式，似乎将国际经济形势从原有的“规则主导”改变为“实力主导”。<sup>22</sup>由于经济实力较强如中国、欧盟等经济体的存在，在现有多边规则谈判中，美国无法进行占优势的谈判，因此选择避开“一对多”的局面，转而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进行双边谈判，发挥其主导的优势。

其中如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在 USMCA 中，三方的争端解决方法不是再采用 WTO 框架下统一的解决机制，而是使用一种高效率、碎片化的方法。美墨两国采用 USMCA 中第 14 章解决机制、墨加两国采用 CPTPP 第 9 章规定的解决机制、美加双方则是跳出 USMCA 中的 ISDS 机制，采用诉诸东道国或者双

---

<sup>21</sup> [https://m.baidu.com/sf/vsearch?pd=realtime\\_ugc&word=拜登%20万亿%20基建&tn=vsearch&sa=vs\\_ala\\_ry\\_ct&lid=9825149981880963459&ms=1&from=844b&atn=list&ruidx=0&ruus=NW91YzA0MzQ2OTY4MTI1MTY1MDA3MTE4XzE2MjAxMDQ3NTI#4346968125165007118](https://m.baidu.com/sf/vsearch?pd=realtime_ugc&word=拜登%20万亿%20基建&tn=vsearch&sa=vs_ala_ry_ct&lid=9825149981880963459&ms=1&from=844b&atn=list&ruidx=0&ruus=NW91YzA0MzQ2OTY4MTI1MTY1MDA3MTE4XzE2MjAxMDQ3NTI#4346968125165007118)，登录时间：2021 年 5 月 4 日。

<sup>22</sup> 韩立余：《当代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碰撞及其发展前景》，《国际经济法学刊》2018 年第 4 期，第 39-40 页。

---

方同意的其它解决方法；在于韩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也同样对 ISDS 进行了重新修订。无论是重新开展与墨西哥、加拿大的《美墨加协议》还是与日本、韩国的双边贸易协议，都体现出美国主导，强迫他国做出让步，甚至直接要求他国进行自愿出口限制，即使这违背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贸易规则。

## 三、美式“小多边主义”给产业链带来的影响

### 1 对全球产业链布局的影响

高度分工的全球产业链虽然提高了生产效率，但也将各个国家经济深度捆绑，一旦一个国家特别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发生不可预料的经济危机，将会对全球的经济造成深远的影响，同时诸如新冠疫情“黑天鹅”事件的发生也会对经济造成严重的打击。加之美式“小多边主义”贸易政策的催化，全球产业链将逐步走向区域化，缩短在全球的分工链条。区域分工会进一步取代去全球分工，从目前的全域贸易来看，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日欧经济合作协定（EPA）、美墨加协议（USMCA）、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实施会进一步强化北美、欧洲、亚洲三大板块的区域化属性。<sup>23</sup>未来全球产业链将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即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组成的北美产业链体系；由德国、法国的等国家主导的欧盟产业链体系；中国、日本、韩国为核心的亚洲产业链体系。三大体系内部自成体系，形成相对闭环，每一个体系与外部也存在部分产业链关联，区域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加强。<sup>24</sup>

### 2 对中国产业链的影响

正如上文所提，美式“小多边主义”对中国的影响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制造 2025”，中国产业链升级的阻力和压力将会进一步加大。自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频繁使用以国家安全为由打压中国，将部分中国的高科技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列入实体清单，驱逐相关研究人员，禁止相关技术和软件的使用。就目前的集成电路、智能制造、新材料、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高端产业而言，虽然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由于在基础研究领域的薄弱，逐渐触及发展进程中的天花板，这势必会加大中国产业链升级的技术突破压力。

其次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将 USMCA 称为美国未来贸易协议的模板，这意味着美

---

<sup>23</sup>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1039220546155666&wfr=spider&for=pc>，登录时间：2021 年 5 月 4 日。

<sup>24</sup> 朱晓乐、黄汉权：《全球供应链的演变及其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载《改革》2021 年第 4 期，第 60-67 页

---

国在将来与其他国家开展贸易协议谈判中，会将“毒丸”条款引入其中。就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与他国进行贸易谈判中，依靠自身的市场经济实力相要挟，颇有“二选一”的趋势。除中高端制造业以外，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受到影响的更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由于目前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再明显，为避免美国关税的影响，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重要影响的跨国公司将会重新考虑在全球的生产布局，或将满足中国市场之外的产能迁至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地区，这不仅冲击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还将影响为跨国公司在华生产的配套企业，势必会对相关产业链造成较大的冲击。<sup>25</sup>

### 3 对发达国家产业链的影响

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份额，体现了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并且可以带动上下游众多产业的发展，解决就业问题。2008 年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全球产业链已经出现扩张停滞甚至呈现阶段性收缩的现象，加之 2020 年新冠疫情的冲击，更是加速了全球产业链的收缩<sup>26</sup>。在国家层面，美式“小多边主义”其中一个目标就是要重振美国的制造业；日本、韩国、欧盟等经济体也会发挥自身的优势，提高对制造业的自主性和可控性，因此不管是对于美国而言还是对于其他经济体，如何解决制造业回流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基本民生和国家安全的产业。

在公司层面，二战以来，在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思想的指导下，跨国公司将自身的产品环分置在全球各地，追求经济和效率的最大化。但是受到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的冲击，全球产业链不确定性增加，这会提高跨国公司由于对某一经济体的过度依赖产生关键零部件中断的风险，特别是最近全球芯片短缺问题十分严重。因此，跨国公司势必会收缩产业链的布局，将产品生产环节有原来追求效率的布局进而转向安全可控的布局。不管是相应国家号召还是处于自身安全的考虑，跨国公司都将重新考虑自己在全球的生产布局，因此部分制造业在未来将会发生回迁的变动趋势。

##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 1 结论

当下世界经济并未完全走出 2008 年的经济危机的阴霾，新冠疫情继续肆虐全球，即使

---

<sup>25</sup> 张轶晴、李宏瑾：《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全球产业链地位冲击的影响研究》，载《黑龙江金融》2018 年第 11 期，第 14-18 页。

<sup>26</sup> 马盈盈、崔晓敏：《全球产业链的发展与重构：大趋势与新变化》，载《全球化》2021 年第 2 期，第 102-135 页。

---

全球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世界经济并不是朝着逆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只不过在二战结束以来 WTO 所倡导最惠国待遇的贸易非歧视原则已经不再适合当今世界贸易的发展，各主要经济体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加人工智能、5G、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催化，各国的产业链都面临升级的压力，基于传统贸易模式的比较优势在主要经济体尤其是世界前几大的经济体之间逐渐消失，产业链的重合程度日益增高，国家间的竞争升级且日趋激烈。就高端制造业而言，不仅关乎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实力和利益分工，更关乎民生、国防等重点领域，是各个国家竞相追逐的目标。

美国在今天的世界经济贸易中的实力早已经今非昔比，曾经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不仅无法阻止制造业空心化的现象，而且成就了如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所以美式“小多边主义”的贸易政策措施便是美国重新主导世界贸易体系，振兴制造业。而这势必会将全球分工的贸易体系逐渐演化成区域分工的贸易体系，在新冠疫情的冲击过后，更加看重产业链的近岸化、本土化。

## 2 我国的应对措施

美式“小多边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将颇为深远。作为世界消费的重要一极，美国贸易政策任何“风吹草动”的变化对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因此中国国际上既要促进 WTO 改革的完成，在维护 WTO 贸易体系的同时又要加强区域贸易合作，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进一步强化东亚经济一体化；国内要继续投入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打通国内市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早日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 2.1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WTO 改革自多哈回合以来，已经陷入长期的停滞，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日益严重。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日益增加，要着力推动 WTO 的改革，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世界贸易话语权，创造更加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和贸易秩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仅 20 余年，从自身的发展路径来看，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有着巨大的潜力，可以创造更多的经济利益。应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利用发展中国家的的发展，进一步享受入世红利。

### 2.2 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

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并进一步强化东北亚经济联系。中日韩三国优势产业链重合程度较低，可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更好的解决当前各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同时文化根基本就一脉相承，自贸区的建设可以加强民间交流，有助于更好的解决历史遗留矛盾，

---

进一步扩大合作,推动中日韩经济区域一体化进程。不仅可以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三国民众生活质量,还可以更加有实力得抵抗美式“小多边主义”裹挟的制裁和胁迫。

### 2.3 调整国内产业结构

准确把握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加快国内地区之间产业调整。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消失的当下,不仅要加快东部产业升级,提升出口竞争力,同时还要加大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抵消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将中低端产业继续留在中国,且进一步向中西部地区迁移,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并借助“一带一路”倡议通过铁路运输向西打开中亚、西亚、俄罗斯等国家的市场。

## 五、参考文献

- [1] 车丕照. 是“逆全球化”还是在重塑全球规则?[J]. 政法论丛, 2019(01):15-23.
- [2] 顾静. 美国多边主义东亚新政策剖析[J]. 东南亚研究, 2011(06):48-55.
- [3] 韩立余. 当代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碰撞及其发展前景[J]. 国际经济法学刊, 2018(04):23-41.
- [4] 蓝庆新, 窦凯.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美贸易摩擦分析[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9(05):67-77.
- [5] 马盈盈, 崔晓敏. 全球产业链的发展与重构:大趋势与新变化[J]. 全球化, 2021(02):102-113+135.
- [6] Ronald Mckinnon. The U.S. saving deficiency, current-account deficits, and industrial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China [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13, 35(3):449-458.
- [7] 沈伟, 徐驰. 逆全球化背景下美式“小多边主义”的端倪和成型——理解《中美经贸协议》(第一阶段)的变局背景[J]. 海峡法学, 2020, 22(03):38-52.
- [8] 苏长和. 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238~239.
- [9] 杨慧. 国际经济机制变迁的竞争性多边主义趋向[J]. 现代国际关系, 2020(01):50-58+49+60.
- [10] 朱晓乐, 黄汉权. 全球供应链的演变及其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J]. 改革, 2021(04):60-67.
- [11] 张轶晴, 李宏瑾.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全球产业链地位冲击的影响研究[J]. 黑龙江金融, 2018(11):14-18.
- [12] 张宇燕, 冯维江. 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J]. 清华金融评论, 2018(07):24-25.
- [13] 张勇. 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地区“少边主义”外交浅析[J]. 美国研究, 2012, 26(02):66-81+4.

---

# 第五章 媒体舆情关注度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李亚娣<sup>27</sup>

**【摘要】**在高度信息化的当今社会，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发挥着收集和传播信息的重要功能。媒体通过引导公众话题和舆论导向，在公司治理中的监督作用已被广泛认可。审计质量是指审计工作水平的高低，具体表现为审计效果的好坏。审计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审计目标的实现，也对社会经济发展稳定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本文基于对 2147 家上市公司在 2013-2017 间的调查，采用可操纵性净利润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分别采用区间诉讼涉案金额，区间诉讼涉案次数以及违规处罚次数作为媒体舆情关注度的衡量指标，进行上市公司媒体舆情关注度对审计质量影响的研究。同时将公司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收益率以及权益收益率作为控制变量。研究结果表明：以区间诉讼涉案金额量化的媒体舆情关注度与审计质量之间有显著关系且呈正相关。即 但监管部门及社会公众依然可以利用大众媒体传递的信号，加强对企业的管理和不当行为的处罚。同时也可以利用媒体信号防范风险。

**【关键词】** 媒体舆情关注度；审计质量；可操纵净利润；区间诉讼涉案金额；区间诉讼涉案次数；违规处罚次数

## 一、引言

在高度信息化的当今社会，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发挥着收集和传播信息的重要功能。媒体通过引导公众话题和舆论导向，在公司治理中的监督作用已被广泛认可。媒体可以选择受众了解的内容，媒体想让受众了解什么，就会突出哪方面内容。田高良等（2016）阐述了媒体通过传统监督机制、声誉机制和市场压力机制发挥公司治理作用。

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其审计质量的好坏决定着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管理绩效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关系到投资者的切身利益。因此不断提升审计质量水平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重中之重和关注的核心内容。审计师事务所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外部审计机构，对企业进行的业务活动进行审计，必须客观公正进行审计，检查其真实性、完整性、合理性和合法性等，履行其职责，出具真实可信的审计报告。管理层有足够的动力来操纵会计数字，特别是管理收益；从而以牺牲其他利益相关者为代价来最大化其利益。审计师是减少这种利益冲突的第三方。因此，审计质量可以通过审计师能够限制盈余管理的程度来衡量。

因此，利用媒体舆情关注度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从而产生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应当被关注。

---

<sup>27</sup>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研究生。

---

现有文献仅指出了媒体关注度和公司之间的关系,或是在某行业小范围进行了媒体舆情关注度对审计意见的关系,因此本文将基于已有结论,研究媒体舆情关注度对整体上市公司审计质量的影响。提出假设:当公司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回报率和权益回报率作为控制变量时,媒体舆情关注度对审计质量产生影响,且正相关。

本文意义在于基于已有媒体舆情关注度对审计质量影响的研究,细化了量化媒体舆情关注度的方式,即在哪些方面可以看出媒体舆情关注度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结论得出以区间诉讼涉案金额衡量的媒体舆情关注度与审计质量有直接关系,而以区间诉讼涉案次数和违规处罚次数衡量的媒体舆情关注度与审计质量无直接关系。本文为量化媒体舆情关注度提供了新思路,且成功证实以区间诉讼涉案金额衡量的媒体舆情关注度与审计质量有直接关系。

本文在第一部分引言介绍了题目的研究背景及意义;第二部分文献综述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对于审计质量和媒体舆情关注度的研究;第三部分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假设推导;第四部分对数据,模型和样本进行了分析;第五部分对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并提出建议。

## 二、文献综述

### 1 审计质量相关文献

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来源于许多方面。Davidson III, W.N. et al. (2005) 指出了审计师的变化以及审计师的选择对盈余管理产生影响,而盈余管理与审计质量有着直接关系。首先审计师的变化属于重大决定,新审计师的工作交接,信息收集都对审计质量产生影响。同时更改审计师的公司很可能是收到了前任审计师的修改意见,因此公司在更换审计师时则偏向选择非六大审计公司从而更容易得到无保留意见,而这将直接影响着审计质量。

Choi, J. et al. (2018) 指出了审计公司规模与审计质量和审计费用之间有着正相关的关系。即与当地的小型审计公司相比,大型地方审计公司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并且这种质量差异在审计服务市场中定价。大型审计公司则意味着高审计费用。Dehkordi, H.F. et al. (2011) 利用 2002 年至 2007 年期间德黑兰证券交易所 (TSE) 公司年度观察样本指出政府审计师 (即大型事务所) 比私人事务所 (即小型事务所) 更能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报告。Reid (2018) 利用英国最近的审计报告变化,发现英国的新报告制度与财务报告质量的提高有关,从而提高了审计质量,而这种质量的提高并未提高审计费用。说明政府良好的监管与规定是可以被审计公司产生正面影响的,从而使得审计公司审计质量提高。国内学者对于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也做了一系列研究。

翟华云等 (2011) 针对 2004-2008 年只发行 A 股的上市公司指出,公司投资倾向越大,

---

即公司规模越大,其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越高。高投资倾向上市公司的审计师面临着更高的审计风险;而审计师为了自身的声誉,以及降低审计风险即提高审计质量,他们有动机减少上市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张艳(2007)指出在资本市场成熟的前提下,事务所的规模可以通过声誉机制法律风险效率影响审计质量。市场认为在美国“四大”客户的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的可信度相比如非“四大”客户更高,因此“四大”客户的融资成本相比较而言更低。即事务所的规模越大,审计质量越高。李连军(2005)采用2520家上市公司作为分析样本,利用他们2000~2002年三年的年审费用进行了实证分析。客户规模、业务复杂程度和审计风险作为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发现国际“五大”合作所的审计服务价格显著高于国内“五大”所,而国内“五大”所的审计服务价格又显著高于国内其他所。这说明审计师的声誉和审计服务价格是正相关的。市场认为审计师的声誉高意味着审计质量高,审计师的声誉在市场上发挥了信号作用。虽然从整体上看,事务所任期越长,审计质量越差,但此现象仅存在于审计风险较低的上市公司中。宋衍蘅等(2012)以中国A股市场上针对2003年至2009年年报发布过补充更正公告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加入了审计风险较高的企业,指出事务所任期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是有限的。在较高的审计风险水平下,事务所不会因为任期较长而丧失审计独立性

## 2 媒体舆情关注度相关文献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将对媒体舆情关注度也进行了多方面研究。针对提高媒体关注度是否能有效提高对会计盈余信息的定价效率,权小锋等(2012)做出了肯定答复,即高的媒体舆情关注可以减少错误定价情况的出现。总体来看,媒体关注具有深度治理效应,其作用机制是:媒体关注,尤其是负面关注,能够有效抑制管理层的盈余操纵行为,从而会计信息质量得到提高,并最终提升了市场对盈余信息的定价效率,减少错误定价的情况。

朱丹等(2017)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指出审计和新闻媒体报道是上市公司重要的外部监督管理机制,二者存在互补性和协同性。而这样的外部监督治理机制与审计质量有着紧密联系。高质量的审计报告通过增加公司的可信度,可以减少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媒体的正面报道能够同高质量的审计报告产生协同效应,进一步减少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而媒体负面报道与高质量审计产生信息分歧,弱化高质量审计抑制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吴伟荣等(2015)表明,媒体监督同政府监督一样与审计质量呈正相关。同时进一步指出,事务所规模在公共压力影响审计质量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针对媒体关注和审计质量的风险抑制作用,尹美群等(2018)使用由上市公司违规数据

---

衡量的经营和交易违规风险与虚假披露风险进行考察分析。研究发现：媒体关注度与审计质量具有风险抑制效应，而且网络媒体关注对风险的抑制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地，网络媒体关注可通过提高审计质量来抑制企业违规风险，审计质量在网络媒体关注与风险抑制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Chen et al. (2018) 针对美国市场指出媒体报道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它对审计质量低，董事会监督薄弱的企业更为明显，表明媒体可以替代其他监督机制在审计市场发挥作用。

基于各方面研究，我们得出媒体的负面报道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更为明显，因此本文以区间诉讼涉案金额，区间诉讼涉案次数，违规处罚次数作为量化媒体关注度的指标。本文可能的创新：证明区间诉讼涉案金额与审计质量正相关，从而进一步证明媒体关注度尤其是负面关注度与审计质量正相关。

### **三、理论分析与假设推导**

#### **1 企业治理**

媒体乘着时代发展和科学进步的大潮逐渐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近年来，媒体不单单再是日常生活的播报工具，它成为了社会经济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网络的飞跃式发展给人们带来了微博、论坛、贴吧等全民交流平台，使得媒体可以发挥社会监督管理功能。媒体关注，尤其是媒体的负面报道在促使企业更好自我治理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

媒体对上市公司进行负面报道后，相关公司和审计单位都会受到影响。媒体负面报道减少了公司与各利益方的信息不对称，即媒体更好地披露了公司的不良信息，降低了各方的信息成本，引起政府、监管部门、投资者、客户和审计公司等各方的关注。各个方面的关注和压力将促使上市公司提高自我治理水平，解决公司现有问题，改善公司现状，并提供更加真实的信息。

#### **2 声誉机制**

出于对自身未来就业机会和薪金的考虑，管理者通常十分重视自己的声誉。因此，媒体可以通过影响管理者声誉的方式实现治理作用。同时，如果媒体对注册会计师的低审计质量进行报道，注册会计师的声誉也会受到损害。这使得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审计任务时会更加严谨，给出的审计意见会更加稳健，更加保守，尤其是颇受媒体关注的上市公司。审计公司和注册会计师在接受审计任务后，他们会付出更多的精力在准备工作中。比如说大量收集被审计公司的基本信息，经营情况以及重大变动事件。对于多次被媒体报道的上市公司，审计公司会更谨慎地完成审计任务。一旦公司出现了负面报道，审计师会在第一时间接受信息，同

---

时对审计工作进行更多的考量。

被审计公司由于在乎公司声誉，所以对于媒体关注，尤其是负面关注非常重视。媒体影响上市公司或是资本市场不是通过拥有公司的所有权或是控制权，而是通过媒体关注形成的舆论压力来间接影响市场，影响管理者的决策行为，公司的治理效率提高，；且影响审计师的工作行为，审计报告的质量提高，从而保障了公司、管理者和审计师的声誉。

可以想象，当上市公司出现了媒体的负面报道，审计师为其提供了低质量的审计服务，公司在客户中的声誉资本会受到严重损害。更糟糕的是，公司不仅需要面临各方面的诉讼赔付，还可能流失现有的客户资源，新客户也难以加入，这样的恶性循环使公司甚至面临着灭绝破产。

### 3 假设提出

本文选取了区间涉案诉讼金额，区间涉案诉讼次数和违规处罚次数作为媒体舆情关注度的衡量指标，通过负面报道产生的诉讼金额和次数研究媒体关注度对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即审计质量的影响（可操纵性应计利润越低，审计质量越高），并提出如下假设：

H1：媒体舆情关注度对可操纵性应计利润有直接影响，且呈负相关。

假设说明：媒体舆情关注度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呈负相关即代表媒体舆情关注度与审计质量呈正相关。

## 四、数据与样本

### 1 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13-2017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区间诉讼涉案金额，区间诉讼涉案次数，违规处罚次数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采用可操纵性净利润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采用修正后的横截面琼斯模型（Modified Jones Model）推算可操纵应计利润（DA），量化可操纵应计利润所需要的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资产总额，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资产数据以及控制变量所需数据来源于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

筛选样本时遵循如下原则：（1）剔除了数据缺失的公司（2）由于需要用到上年的数据，剔除了当年与去年新上市的公司。筛选过后，2013-2017 年各年获取符合要求的样本数为 2147 个，数据处理采用 EXCEL 与 Stata 软件。

### 2 变量选择及模型构建

#### 2.1 衡量审计质量

本研究中审计质量的计量是最关键的环节。我们一般定义审计质量是外部审计发现并揭露企业的会计错弊的概率，代表着审计工作水平的高低。而企业的会计错弊主要表现在盈余的质量上，因盈利指标是评价一个企业的重要指标，企业经营者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有意愿地调整其利润。调整利润主要通过不伴随现金流的应计利润，尤其是可操纵应计利润来实现。因此，我们采用企业的可操纵应计利润（DA）的绝对值来度量审计质量，即可操纵应计利润的绝对值（ABSDA）越低，审计质量越高。

本文采用修正后的横截面琼斯模型（Modified Jones Model）推算可操纵应计利润（DA）。修正后的横截面琼斯模计算过程如下：

$$TA_i = \alpha (1/A_{i-1}) + \beta \{(\Delta REV_i - \Delta REC_i / A_{i-1})\} + \gamma (PPE_i / A_{i-1}) + \varepsilon_i$$

其中， $TA_i$ 为企业*i*年的总应计利润：(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A_{i-1}$ ； $A_{i-1}$ 代表企业*i-1*年末的资产总额； $\Delta REV_i$ 为企业*i*年营业收入的增减额； $\Delta REC_i$ 为企业*i*年应收账款增减额； $PPE_i$ 为企业*i*年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递延资产合计数； $\varepsilon_i$ 为残差项。

其次，根据如下回归方程求出的回归系数 $\alpha'$ 、 $\beta'$ 、 $\gamma'$ 代入以下方程并计算企业的非操纵应计利润(NDA)：

$$NDA_i = TA_i = \alpha' (1/A_{i-1}) + \beta' \{(\Delta REV_i - \Delta REC_i) / A_{i-1}\} + \gamma' (PPE_i / A_{i-1})$$

最后，应计利润实际值( $TA_i$ )减去应计利润的预测值( $TA_i'$ )，即非操纵应计利润(NDA)，求出可操纵应计利润(DA)： $DA_i = TA_i - NDA_i$ 。

## 2.2 研究模型

$DA = \beta_0 + \beta_1 \text{MEDIA ATTENTION} + \beta_2 \text{CRATIO} + \beta_3 \text{QRATIO} + \beta_4 \text{ROA} + \beta_5 \text{ROE} + \varepsilon$ ，其中 $\varepsilon$ 为随机误差项。

## 2.3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因变量	可操纵应计利润	DA	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根据 4.2.1 求得
自变量	媒体舆情关注度	MEDIA ATTENTION	分别以区间诉讼涉案金额 (FARE)，区间诉讼涉案次数 (LIG_FRE)，违规处罚次数 (VIO_FRE) 三项指标对媒体舆情关注度进行衡量
	流动比率	CRATIO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控制变量	速动比率	QRATIO	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资产收益率	ROA	净利润/总资产
	权益收益率	ROE	净利润/总权益

##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 1 描述性统计

通过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的方式，了解数据的分布特征，得到表 5-1，其中包括样本数，平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

表 5-1 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Obs	Mean	Std. Dev.	Min	Max
DA	10735	0.429	3.481	-0.862	288.246
FARE	10735	13634839	38907345	0	5260000000
LIG_FRE	10735	0.559	3.097	0	125
VIO_FRE	10735	0.043	0.236	0	4
CRATIO	10735	2.434	3.376	0.106	98.22
QRATIO	10735	1.894	3.016	0.0483	68.975
ROA	10735	0.004	0.007	-0.111	0.095
ROE	10735	0.007	0.042	-1.622	2.93

表 5-1 显示，共有 2147 家上市公司，因此 5 年的数据共有 10735 个样本量。衡量因变量审计质量的可操纵应计利润 DA 的平均值为 0.429，标准差为 3.481，最小值为-0.862，最大值为 288.246。衡量自变量媒体舆情关注度的区间诉讼涉案金额平均值为 13634839，标准差为 38907345，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5260000000；区间诉讼涉案次数平均值为 0.559，标准差为 3.097，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125；违规处罚次数平均值为 0.042，标准差为 0.236，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4。控制变量流动比率平均值为 2.434，标准差为 3.376，最小值为 0.106，最大值为 98.22；速动比率的平均值为 1.894，标准差为 3.016，最小值为 0.048，最大值为 68.975；资产收益率平均值为 0.004，标准差为 0.007，最小值为-0.111，最大值为 0.095；权益收益率平均值为 0.007，标准差为 0.042，最小值为-1.622，最大值为 2.93。

### 2 相关性分析

描述性统计后需要进行两两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从而检验相关性的显著性，若解释变量相关性较高，则会对模型结果产生不好的影响。接下来相关性分析得到表 5-2。

表 5-2 相关系数表

	DA	FARE	LIG_FRE	VIO_FRE	CRATIO	QRATIO	ROA	ROE
DA	1.000							
FARE	-0.09 0.001	1.000						
LIG_FRE	-0.006 0.556	0.335 0.000	1.000					
VIO_FRE	-0.002 0.817	0.138 0.000	0.146 0.000	1.000				
CRATIO	0.007 0.503	-0.09 0.001	-0.041 0.000	-0.027 0.006	1.000			
QRATIO	0.008 0.407	-0.086 0.001	-0.037 0.000	-0.026 0.006	0.981 0.000	1.000		
ROA	0.023 0.016	-0.061 0.019	-0.067 0.000	-0.096 0.000	0.105 0.000	0.115 0.000	1.000	
ROE	0.009 0.346	0.006 0.806	-0.019 0.045	-0.047 0.000	0.001 0.318	0.011 0.269	0.349 0.000	1.000

注：0.3-0.5 为弱相关，0.5-0.8 为中相关，0.8 以上为强相关。第一行为相关系数，第二行为 p 值。

由表 5-2 的相关性分析可知，变量间除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本身具有强相关性以外，其他变量间的相关性未达到强相关，不会对模型结果产生较大影响。

### 3 回归分析

接下来将根据已有模型对媒体舆情关注度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进行回归分析，并得到表 5-3。

表 5-3 回归分析表

	模型一 (FARE) DA	模型二 (LIG_FRE) DA	模型三 (VIO_FRE) DA
MEDIA ATTENTION	-0.134*** (-3.28)	-0.005 (-0.43)	0.006 (0.19)
CRATIO	-0.04	-0.034	-0.033

	(-1.82)	(-0.66)	(-0.65)
QRATIO	0.066** (2.55)	0.043 (0.75)	0.043 (0.75)
ROA	-0.507 (-0.37)	0.406* (2.08)	0.407* (2.10)
ROE	0.369* (1.71)	0.116 (0.14)	0.115 (0.13)
_cons	0.33*** (18.95)	0.384*** (7.92)	0.381*** (7.85)
N	10735	10735	10735
Adj R-squared	0.446	0.025	0.015

注1：模型一、二、三分别是以区间诉讼涉案金额(FARE), 区间涉及诉讼次数(LIG\_FRE), 违规处罚次数(VIO\_FRE)作为自变量媒体舆情关注度(MEDIA\_ATTENTION)的衡量指标进行的。

注2：p值分布为0 ‘\*\*\*’ 0.001 ‘\*\*’ 0.01 ‘\*’ 0.05 ‘.’ 0.1 ‘ ’ 1

注3：第一行为系数，第二行为t值。

表5-3显示本次回归分析的结果：区间诉讼涉案金额(FARE)的回归系数为负，且结果显著，自变量系数为0.134，p值为0.001。意味着区间诉讼涉案金额量化的媒体舆情关注度与审计质量有极显著关系，媒体舆情关注度能够直接影响审计质量。即区间诉讼涉案金额增加使得可操纵应计利润降低，从而提高审计质量。

区间诉讼涉案次数(LIG\_FRE)和违规处罚次数(VIO\_FRE)的回归系数为负，但结果不显著，自变量系数分别为-0.005和-0.006，p值为0.231和0.851。出现此现象的原因可能有：  
1. 区间诉讼涉案次数和违规处罚次数不能很好的量化媒体舆情关注度。因技术条件限制，共10735个区间诉讼涉案次数和违规处罚次数样本数据中，存在大量显示为0的样本数据。我们无法判断0代表此项区间诉讼涉案次数或违规处罚次数为0或者此项为遗漏数据项。选择区间诉讼涉案次数或违规处罚次数作为衡量媒体舆情关注度的原因是媒体关注尤其是媒体负面关注更可能对审计质量产生影响。但是区间诉讼涉案次数和违规处罚次数与媒体舆情关注度之间联系不如区间诉讼涉案金额更紧密。  
2. 中国审计市场内媒体舆情关注度对审计质量影响的传导机制运行一般，并不能体现出他们之间最准确的关系。也就是媒体在审计市场上充当的信号作用以及声誉机制并不完善。这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发达有关。媒体对上

---

市公司的舆情关注度并不能引起企业和审计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导致媒体舆情关注的作用发挥受限。除应用区间诉讼涉案金额外,应采用更直接能量化媒体舆情的指标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进行回归分析,看媒体舆情关注度是否能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产生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媒体舆情关注度增加能导致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减少,从而使得审计质量增加。若仍然关系不显著,则原因为 2。

## 六、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对 2147 家上市公司在 2013-2017 间的调查,采用可操纵性净利润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采用区间诉讼涉案金额,区间诉讼涉案次数,违规处罚次数作为媒体舆情关注度的衡量指标,进行上市公司媒体舆情关注度对审计质量影响的研究。首先采用修正后的横截面琼斯模型(Modified Jones Model)推算可操纵应计利润(DA),之后建立以可操纵应计利润为因变量,区间诉讼涉案金额,区间诉讼涉案次数,违规处罚次数为自变量,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收益率,权益收益率为控制变量的模型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为当媒体舆情关注度以区间涉及诉讼金额衡量时,假设 H1 成立;当媒体舆情关注度以区间涉及诉讼次数和违规处罚次数衡量时,假设 H1 不成立。不成立的原因可能有两种:一是统计口径可能并不完善,微小事件并未纳入统计;二是区间诉讼涉案次数和违规处罚次数不能很好的量化媒体舆情关注度,即这两方面在中国审计市场上媒体充当的信号作用以及声誉机制并不完善。

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从负面媒体关注的角度发掘区间诉讼涉案金额,区间诉讼涉案次数,违规处罚次数作为衡量指标,尽管以后两项作为衡量标准时结果不显著,但第一项的显著结果仍为量化媒体舆情关注度提供了新思路。同时本文也可能体现了我国审计市场上媒体方面只能有限地发挥作用,但媒体依然是监管部门和社会大众加强对企业监管和不当行为处罚的重要方式。同时也可以利用媒体信号防范风险。

本文的局限在于媒体舆情关注度的量化指标可能不够科学,区间诉讼涉案次数和违规处罚次数与媒体舆情关注度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同时由于技术原因,以上两者的统计口径可能不完善。

本文提出如下建议:应当加强媒体关注在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充分发挥媒体在市场上的信号作用。媒体不仅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还可以充当监管企业的手段。随着媒体在我国资本市场上的地位稳固,媒体舆情关注度在审计市场的作用也会越来越明显。

---

## 七、参考文献

- [1] 田高良, 封华, 于忠泊, 2016, 《资本市场中媒体的公司治理角色研究》, 《会计研究》。
- [2] 翟华云, 廖洪, 2011, 《投资机会、审计风险与审计质量研究》, 《审计与经济研究》, 第 26 卷第 4 期。
- [3] 张艳, 2007, 《论事务所规模化与审计质量保证》, 《审计与经济研究》, 第 22 卷第三期。
- [4] 李连军, 2005, 《审计市场中的信号显示机制 : 理论与实证分析》, 《产业经济研究》, 第 1 期。
- [5] 宋衍蘅, 付皓, 2012, 《事务所审计任期会影响审计质量吗?——来自发布补充更正公告的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会计研究》。
- [6] 权小锋, 吴世农, 2012, 《媒体关注的治理效应及其治理机制研究》, 《财贸经济》, 第 5 期。
- [7] 朱丹, 李琰, 2017, 《审计质量、媒体报道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产业经济研究》, 第 6 期。
- [8] 吴伟荣, 刘亚伟, 2015, 《公共压力与审计质量——基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视角的研究》, 《审计研究》, 第三期。
- [9] 尹美群, 李文博, 2018, 《网络媒体关注、审计质量与风险抑制 ——基于深圳主板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审计与经济研究》, 第 4 期。
- [10] Davidson III, W. N., Jiraporn, P. and DaDalt, P. (2005):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Audit Shopping: An Analysis of Auditor Opinions,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Auditor Changes ” .
- [11] Becker, C., DeFond, M., Jiambalvo, and K. Subramanyam. (1998) “The Effect of Audit Quality on Earnings Management” .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 [12] Choi, j., Kim, C., Kim, J. and Zang Y. (2018): “Audit Office Size, Audit Quality and Audit Pricing” .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and Theory*.
- [13] Dehkordi, H. F. and Makarem, N. (2011): “The Effect of Size and Type of Auditor on Audit Quality ” . *Intern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EuroJournals Publishing, Inc.*
- [14] Chen, Y., Cheng, C. S. A., Li, S. and Zhao, J. (2018): “The Monitoring Role of the Media: Evidence from Earnings Management” .

---

# 第六章 贸易摩擦和疫情对中国制造业的冲击及 对策研究<sup>28</sup>

李美君 苏畅 刘星彤<sup>29</sup>

**【摘要】**近两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对全球价值链的现有协作模式造成了挑战，通过分析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制造业在疫情暴发后的发展情况，可以得出，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短期内发展不会有较大变化；受制于贸易摩擦和疫情影响，高端制造业长期发展掣肘；同时由于外部环境更加动荡，GVC出现重构趋势。在此背景下，中国未来需要稳定低端制造业在全球的定位，长期发展高技术制造业，此外，国际上要提防国际风险，发展区域贸易伙伴关系。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中国制造业；新冠疫情；贸易摩擦

## 一、引言

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近几年来，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多变，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孕育发展，全球产业链出现重构趋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为控制住本国产业在高端价值链上的位置，采用贸易摩擦等手段意图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阻碍。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物流与交通运输被割断，消费品和服务业、制造业等都遭受较大冲击，不断反复的境外疫情对有出口行为的企业产生较强冲击，以上因素均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产生新的挑战。

### 1、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

尽管已度过十年之久，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仍未消散，《全球价值链报告(2019)》指出，即使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10年，GVC参与度的全球平均发展态势仍未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以特朗普政府实行的“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所引发的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中美加征关税等多次冲击使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活动受到阻碍。

特朗普政府的这些举措不仅不利于中美贸易的发展，也对世界贸易的发展产生影响。2019年，特朗普发布汽车关税威胁、美墨加协议一波三折等摩擦使得2019年国际贸易增长大幅回落。2021年6月17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名为《后疫情时代全球价值链的未来》

---

<sup>28</sup> 本项目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资助（项目批准号：G2020203004）

<sup>29</sup> 李美君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邮箱：19021074@bfsu.edu.cn。（北京，100089）

苏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邮箱：19021082@bfsu.edu.cn。（北京，100089）

刘星彤，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邮箱：19021073@bfsu.edu.cn。（北京，100089）

---

的报告称,近年来,不断打响的贸易战使全球价值链损失了 3 到 5 年的增长机会。

美国不仅仅将贸易摩擦的矛头指向了中国,更是以贸易摩擦为借口,挑起了欧美之间的大国博弈。美国对内设立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本国产品出口,对外大力抵制欧盟向本国企业征税,在 2020 年 6 月,美国就数字税问题对欧盟、印度等 10 个国家或地区展开“301 调查”,加剧了西方经济体之间的利益争夺。

## 2、新冠疫情加剧国际贸易萎缩态势

2020 年年初,受新冠疫情冲击,2020 年许多国家被迫进入长达数月的封锁期,全球经济活动急剧下降,国际贸易继续萎缩,从当年第二季度的世界货物贸易情况来看,萎缩幅度显著扩大。2020 年一季度和二季度,世界货物出口额同比下降分别为 6.4%和 21.3%。比 2019 年同期降幅分别扩大 4.0 个和 18.1 个百分点。

在前述问题的基础上,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已然已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化重构的催化剂。许多国家开始破除以往“国际分工”、“全球布局”的战略,经济利润最大化将不再是经济体进行产业分工合作的唯一标准,许多国家渐渐呈现出推动高端产业链回国、低端产业链分散布局的产业布局趋势。在此背景下,跨国公司的生产要素配置从全球价值链效率转向国家供应链安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着诸多风险挑战,同时也蕴含着新的机遇。

## 3、全球价值链理论为解决相关国际贸易问题提供理论基础

全球价值链理论(Global Value Chain,简称 GVC)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主要以商品为载体分析商品参与全球贸易的全过程,但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贸易主体与贸易形式的增多,GVC 理论从单一分析转向动态分析。由于交通、互联网及其他运输方式及交易方式越来越便利,许多国家参与到国际分工中来,根据比较优势理论,通常仅仅专注于发展自身在 GVC 上具有比较优势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环节。

日益专业化的国际分工局面,放大了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中国在发现疫情后果断采取措施阻止疫情传播,经济逐渐复苏,但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疫情依然不稳定,对全球价值链的稳定运行造成极大冲击。

基于国际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的现状,本文将探讨以上双重冲击对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造成的影响,从而分析其波动趋势,为中国制造业应对冲击提供可行的政策建议,以促进中国制造业稳固发展,促进其在 GVC 中的位置实现攀升。

## 二、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现状分析

中国制造业分工细密，一般参与产品价值链上相对低附加值的工序片段，为世界基础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根据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计算，现代工业共有 41 个工业大类，191 个中类，525 个小类，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具有完整的 21 个工业大类，191 个中类，525 个小类的国家。与中国相比，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仅有 94% 的工业类目，可以说，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存在于中国。受益于完整的产业体系，2020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 32.16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9%，是在遭受疫情冲击后，全球外贸唯一出现正向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工业得到长足进步，但并未完全工业化。国际上衡量工业化程度，主要有四项相关指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即 GDP），工业化率，三产结构及城镇化水平，根据这些指标测度，目前中国 GDP 连续 2 年超过 1 万美元，仍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从 2020 年中国各类产业的产值来看，第三产业产值尚低，第一产业占比仍较高，且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发展有较大缺陷；从城镇化水平来看，中国城镇化水平每年增速为 1%，目前超过 60%，仍未达到发达国家 70% 的城市镇率水平。这四个指标中，仅有工业化率已达到世界第一的水平，在其他三项指标上，均存在发展不足。中国工业水平技术密集度不高，属于中低度技术密集型，处于价值链的中下游，在高度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中，在全球市场上占有率最高的为汽车制造业，也仅有 16% 的比例。中国制造业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向上的攀升需要长时间的技术攻克与积累过程。



图 6-1 中国制造业 GVC 位置指数（2000-2014）

数据来源：基于 UIBE GVC 数据库计算所得

图 6-1 为 2000 年-2014 年期间中国制造业 GVC 位置指数变化详情，可以看到，中国制

---

制造业指数呈上升趋势，但是位置较低，到 2014 年时也并无较大变化，指数仅为 0.93，根据相关数据测算，作为邻国的日本、韩国两国的 2014 年 GVC 整体位置指数分别为 0.95、0.94，这说明中国不仅在世界上处于价值链下游位置，在区域中也不占优势，制造业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从国际环境上来看，2020 年底，中国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 RCEP)，这意味着在以后的国际贸易中，在 15 个伙伴国家内部可以实现自由贸易往来，并且在 10 年内，在伙伴国之间进行贸易，关税将为零。这将极大程度上刺激伙伴国内部的贸易与投资行为，对区域内形成稳定的贸易伙伴关系奠定政策基础。中国的开放经济格局已呈现出“共轭环流”开放格局，成为连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价值链的交汇国，形成了完整独立的产业体系。根据工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已达到 31.31 万亿元人民币，连续 11 年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位置，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制造业中的贡献比重接近 30%。

### **三、双重冲击对中国制造业产生的影响趋势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的制造业受到来自交通运输中断、原材料供应短缺等方面的冲击。比如，在疫情较严重的期间，我国的呼吸机产能不足全球的 1/5，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呼吸机生产线受到了全球化核心零部件供应不足的制约。因此，建立完整、安全、稳定的产业链，对中国制造业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位置上的攀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1、短期内，中国制造业的 PMI 指数无较大波动**

PMI (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 是快速反映市场动态的先行指标，对于衡量制造业发展态势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如制造业 PMI 指数在 50% 以上，反映制造业经济总体处于扩张状态；如低于 50%，则通常反映制造业经济总体处于衰退局面。本文筛选出近 12 个月的中国制造业 PMI 指数，以直观地反映疫情在中国得到控制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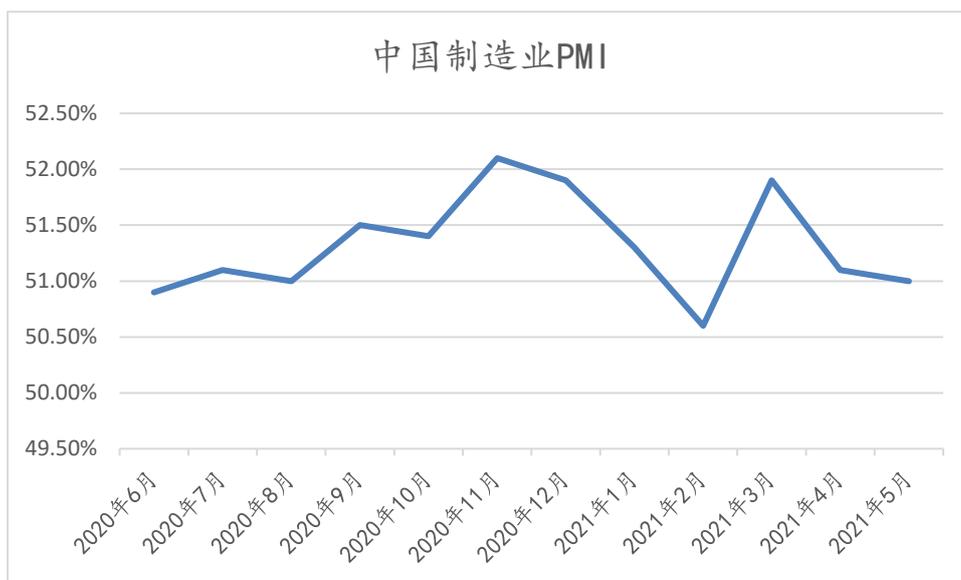


图 6-2 中国制造业 PMI 指数 (2020 年 6 月-2021 年 5 月)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整理所得

从图 6-2 中可以看到，自 2020 年 6 月起，中国制造业逐渐复苏，2020 年 6 月到 2021 年 5 月，中国制造业发展的 PMI 指数均处于 50% 的数值以上，表明制造业总体处于扩张状态。由于 2021 年 1 月到 2 月临近中国春节假期，制造业 PMI 指数有所收缩，但整体仍高于 50% 的水平。

图 6-2 说明，自疫情暴发以来，在政府的大力控制下，短期内，中国制造业未受到严重影响。从国内的产业体系来看，中国的制造业能够快速恢复运转，与内部完整的产业体系是分不开的。中国制造业生产工序的有序快速恢复可以为其他贸易伙伴提供良好的支持，口罩等医疗用品的生产也为其他经济体的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支持。

根据陈勇等（2021）的分析，疫情暴发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主要遭受了两个阶段的冲击，在疫情发生后的第一个阶段，疫情最严重的湖北省高技术制造业出口比重较低，对全国影响较小，且其他省份高技术制造业产业链对湖北省的依赖度较小，因此，疫情不会对中国高技术制造业整体的产业链造成严重影响。事实证明，在 2020 年 3 月初，中国许多地区的制造业企业开始有序复工复产，制造业生产所必须的原材料、劳动力等问题也渐渐得到解决，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生产活动并未受到较大影响。在疫情暴发后的第二阶段，由于中国政府的及时决策，中国境内的疫情态势已得到初步控制，但是世界其他地区的疫情日益加剧，产业链的波动对中国制造业乃至全球制造业价值链造成冲击。

## 2、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发展水平较低

疫情导致供应链加速调整，结构破碎，对中国参与国际生产需要的原材料及技术等均产生较大阻碍，中国制造业中与全球价值链紧密联系的几个行业多为加工制造等技术含量较低的行业。虽然目前在关键组件的生产及装配环节，还很难有经济体可以完全替代中国的作用，但是在中间品组装和测试环节，许多跨国公司在接近最终市场的国家和地区找到了部分产业链环节的半成品替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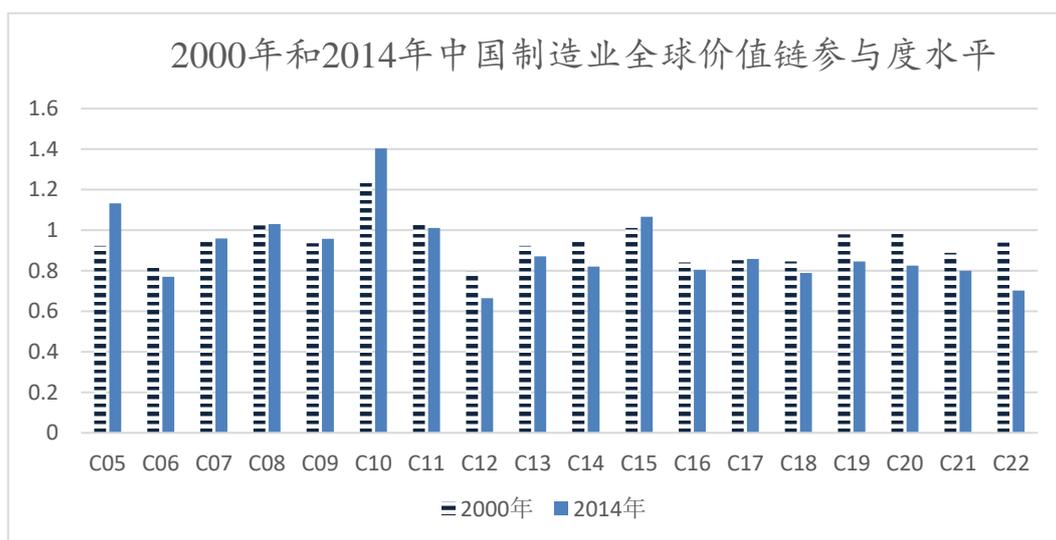


图 6-3 2000 年和 2014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水平

数据来源：基于 UIBE GVC 数据库计算所得

图 6-3 为 2000 年和 2014 年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水平对比，以 2014 年为例，中国在 C05（食品、饮料和烟草产品制造）、C07（木材、木材制品及软木制品的制造）、C12（基本医药产品和医药制剂制造）、C22（家具制造，其他制造）行业中参与度最高，韩国在 C06（纺织、服装、皮革制品制造）、C08（纸和纸制品制造业）、C10（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制造）、C11（化学品及化学制品制造）、C13（橡胶和塑料制品制造）、C14（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C15（基本金属制造）等行业中，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较高，高技术制造业如 C12（基本医药产品和医药制剂制造）、C17（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水平的程度较低。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2000 年至 2014 年，中国制造业大部分细分行业参与 GVC 的程度均出现了明显提升的相似特征。尤其是化学品与非金属矿产品制造业，电子、电器与光学设备制造业的，纺织、皮革制造业，家具制造业的参与指数都有了明显加强。说明中国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参与有向中高技术制造业移动的趋势，在高技术制造业中仍有较大劣势。

从产业链需求端和供给端来看，因其他经济体的疫情仍有反复和蔓延态势，各国纷纷采

---

取了撤回产业链或者分散产业链风险的举措,这使得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下游的中国制造业开始面临高新技术与原材料短缺的危险。因此从长期来看,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可能面临较大威胁。

### 3、国际环境变化为中国制造业发展造成新的挑战

近几年,美国政府一直在谋求“产业回流”,在2017年底实施税改后,美国跨国企业即开始调整海外政策,造成全球FDI总体下降的局面。根据《世界投资报告2019》显示,201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1.3万亿美元,已是连续第三年出现下滑。在拜登政府上任后,美国积极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拜登政府发布的《2021年贸易议程报告(2021) Trade Policy Agenda》中宣布要“建设一个更强大的工业和创新基地”,为实现此目标,拜登政府发行一系列政令,从半导体到医疗用品、从关键矿产到高容量电池,一系列有关被美国垄断技术的商品、原材料被进行广泛评估,供应链受到严密监视;另外,拜登政府还将继续加大科研投入,并对半导体、稀土等高技术行业产业链进行保护(张晓通2021)。

在GVC中高端的部分,中国与发达国家保持着较大的差距,如图3中,中国的高端制造业参与水平不高,在2014年,中国的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仅为0.85左右,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水平。中国一直缺乏相关技术能力,如芯片等技术被美国垄断,导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举步维艰。中国的高端制造业中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华为公司发展势头迅猛,得到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这导致美国严格封锁华为公司。根据美国政府修改后的产品规则显示,任何芯片企业只要使用了美国的软件或者生产设备,都必须取得美国政府的许可才可以向华为供货。从长期来看,不排除美国或者其他发达经济体对类似华为的中国高端制造业的龙头进行持续打压(袁振邦,2021)。

在疫情持续蔓延的情况下,欧盟也出台相应政策,意图进行对欧盟成员国内关键产业进行产业保护。为规避直接进口中的关税壁垒或政策限制,中资企业将并购的目光投向了一些疫情期间无力经营的欧盟企业,为阻止中国进行并购,据欧盟领导人透露,欧盟将发布一份指导性文件,使政府能够介入并购行为,以此为中国对欧盟关键企业的并购行为增加阻碍(周小明,2020)。越来越严峻的国际经贸局势将对中国制造业发展提出新的挑战。

##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基于中国制造业近年来的发展现状,引入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位置上的指数测算结果,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位置变化趋势进行预测。本文认为中国制造业的

---

发展应该稳固在低端制造业中的位置，同时加大技术投入，发展高技术制造业，此外，应该发挥国内国外“双循环”的优势，利用现有规则与贸易伙伴培养新型合作关系。

## 1、结论

### （1）中国制造业在 GVC 中的位置短期内不会有较大变化

经济体在 GVC 中的位置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通过供应链、产业链等相关链条传导至具体产业后所造成的结果，因此，在短期内，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不会有太大变化，且主要体现在低技术制造业上，如加工与装配这样的环节。虽然其他国家在分散产业风险时，转移低端制造业的目的地是东南亚及南亚一些成本低于中国的国家，但是因目的地内部缺乏熟练工人，没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因此短期内想要完全取代中国的低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是不可能的。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处于中下游，因此，短期内中国制造业的 GVC 位置比较稳固，不会有较大变化。

### （2）受制于贸易摩擦和疫情影响，高端制造业长期发展掣肘

但是从长期来看，一方面由于中低端制造业易模仿、操作性强，东南亚、南亚国家劳动力成本低廉，以及西方某些国家对出口贸易的阻碍，发达国家出于分散供应链风险的需要，有将低端产业转向东南亚、南亚国家的趋势；另一方面，高端制造业的关键技术被西方发达经济体“卡脖子”，关于 GVC 上游位置的争夺将会更加激烈，经贸摩擦、关税壁垒等西方经济体惯用的手段可能会更频繁地出现于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中。

### （3）外部环境更加动荡，GVC 出现重构趋势

疫情暴发引发了各国在应急管理、公共卫生等领域上的反思（高波，2021），这势必会加强许多国家对本国产业体系的把控，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合作的局面很可能出现改变。正是由于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体系，所以在经历疫情后可以快速复工复产。以往将低端产业一味转移出去的国家也希望产业发展不再受制于他国，纷纷实行“再工业化”战略，这将会导致 GVC 中下游不再集中于某几个或一个国家（如中国）；西方国家将会更严格保护本国的战略产业，这或许会固化 GVC 上游的位置，加大其他国家制造业向 GVC 上游攀升的难度。

## 2、政策建议

### （1）现阶段应稳定低端制造业在 GVC 上的位置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短期内，中国在 GVC 中下游的位置暂时较稳固，但是长期内面临

---

来自东南亚、南亚等地区国家的威胁。中国的全产业链为中国抵御外部冲击、提供就业岗位都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因此，对于处于 GVC 下游的产业应采取“稳住”措施。如引导东部沿海地区的低端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在中西部地区培养熟练工人，利用中西部地区低廉的租金、丰富的劳动力，分摊低端制造业的成本，维持中国的全产业链优势。

同时，充分发掘中国国内市场的潜力，维持国内国外“双循环”格局。2020 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391981 亿元人民币，即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品零售市场。另外，中国的电子商务也在快速发展，中国已连续 8 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为了引导中国市场进行良性发展，相关政府应促进企业运营相关法律的完善，实现营商流程的便利性和高效性，为中国制造业发展提供基石，维持中国市场发展的长期可持续性。

### （2）长期要促进高技术制造业向 GVC 上游攀升

中国制造业在 GVC 上的位置较低，主要原因是高端技术制造业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中国政府应为有能力的企业提供税收、租金、人才引进激励等措施，鼓励相关领域的代表企业研发核心技术，培育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全球关键企业，并引导权威企业参与到行业标准的制造中去，对掌握关键技术的龙头企业实行专利保护等措施；同时，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支持首台（套）关键设备、关键零部件等的市场应用，加速国产替代。

制造业传统制造企业可以发挥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以国内市场经济规模为试点，发挥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的带动作用，鼓励制造业行业突破传统手段，创新生产模式，打造以技术进步为主导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增强高端市场认知标签，促进价值链延伸，从而促进中国制造业在 GVC 位置上的提升（马永飞，2021）；在人才管理上，企业可以发挥线上办公、协作研发等新型办公方式的优势，在线聘请国外资深技术人员远程指导，并由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为企业引进外籍专家提供政策上的帮助。

### （3）国际上要提防国际风险，发展区域贸易伙伴关系

全球经济与政治格局多变，中国应该把握“一带一路”倡议及“RCEP”的签署所带来的机遇。“一带一路”沿路国家均是对华有友好接触的国家，有利于中国进行对外投资，沿线国家之间进行友好的贸易往来与经济合作；“RCEP”的签署也有利于提升亚太经济一体化水平，打破过去西方国家主要经济体为了自身利益建立的“游戏规则”。

一方面，中国应利用已签署的区域协议，发展区域贸易伙伴关系，在应急管理、公共卫生、5G 技术等关系民生的产业与技术方面，积极拓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RCEP”成员国的合作程度，拓展相关产业链，通过建立公共卫生大数据平台促进伙伴国家间的

---

国际卫生合作，促使中国价值链地位在新型合作关系中发挥新的优势；另一方面，考虑并尊重到区域内及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以“一带一路”倡议和“RCEP”为契机强化以价值链构建为核心的区域贸易和投资平台，促进区域内部产业技术资源和生产要素资源融合，实现区域内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共赢。

## 五、参考文献

- [1] 陈勇, 柏喆. 新冠疫情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04):69-83.
- [2] 高波. 疫情加剧市场失灵, 价值链重组求新解[N]. 国际商报, 2021-04-19(004).
- [3] 马永飞. 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研究[J]. 国际贸易, 2021(02):47-54.
- [4] 袁振邦, 张群群. 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双重冲击下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与中国对策[J]. 当代财经, 2021(04):102-111.
- [5] 张晓通, 郝念东, 王优酉. 美欧对 RCEP 的地缘经济认知及其政策调整[J/OL]. 东北亚论坛:1-13[2021-06-26]. <https://doi.org/10.13654/j.cnki.naf.2021.04.006>.
- [6] 周小明. 发达国家转向经济主权, 全球供应链“能屈能伸”[EB/OL]. (2020-04-26)[2020-11-13]. [http://www.guancha.cn/ZhouXiaoMing/2020\\_04\\_26\\_548273.shtml](http://www.guancha.cn/ZhouXiaoMing/2020_04_26_548273.shtml).

---

## 第七章 估值效应波动与全球经济失衡<sup>30\*</sup>

陈瑞<sup>31</sup>

---

<sup>30</sup>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单位意见。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文责自负。本文已被其他刊物录用，请勿公开发表或发布。

<sup>31</sup> 作者简介：陈瑞，男，汉族，经济学博士，美国普渡大学统计系访问学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方向：货币经济、数量经济。

---

## 第八章 数字普惠金融能减少中国的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吗？（略）

任康钰 陈思佳<sup>32</sup>

---

<sup>32</sup> 北京外国语大学